

魔窟生涯

——一个军统少将的自述

沈醉口述 沈美娟整理



魔窟生涯

——一个军统少将的自述

沈醉口述 沈美娟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介 绍

《魔窟生涯》是沈醉继《戴笠其人》和《军统内幕》之后的又一部揭露性作品。

本书中，作者以自己十八年军统特务生活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并通过自己的罪恶生涯，表现了一个青年灵魂堕落的过程。故事曲折生动，文笔流畅细腻。

责任编辑：白舒荣 王小平 黄 伊

封面设计：柳 泉

魔窟生涯

MOKU SHENCY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23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1}{2}$ 插页2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60,001—76,500

书号10019·4090

定价1.50元

前 言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的一生就是经历了热血青年——反革命刽子手——新中国的公民这一漫长的历程的。我由刽子手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过程，曾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作了较详尽的叙述。而我在解放前十八年中的活动虽在《文史资料》、《戴笠其人》和《军统内幕》中有所揭露，但真正涉及到我个人罪恶生涯的并不多。与一般人相比，那十八年在军统的生涯也可谓是曲折离奇的了。然而，曲折也罢，离奇也罢，我毕竟是当时社会的产儿，绝非天生怪物。

说实在的，我在刚刚懂事，即上小学、中学时，也曾立志要做个热爱祖国、能为人民做些好事的人。但家庭、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个性、品质等等复杂原因，竟使我从十八岁起就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生涯。

不少人常来信或当面问我：你既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蒋介石、戴笠的同乡，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怎么能在二十八岁就当上国民党军统少将总务处长的呢？问者可以脱口而出，答者可就不那么轻松了。这个问题，正是我在写文史资料时羞于说出也无法三言两语说清的问题。过去我对

FY36/OP

于上司指派我干的罪恶，往往还敢于揭露出来告诸读者，因为那是奉命而为。可是出于自己私心，出于欲求升官发财的意念而犯下的罪行，往往就难于启齿。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敬爱的周总理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当面指示我，要我把过去所作所为、亲见亲闻如实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遵照总理的指示，我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出于私心我没有把全部都写出来。每思此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觉得愧对总理。

前年，我七十岁了，寿辰之日，我曾即兴赋诗以自勉，诗曰：

“古稀今不稀，盛世多期颐，
报国献余热，无鞭自奋蹄。”

我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只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见不得人的往事公诸于世，才对得起周总理的教导；百年之后，才有面目去向周总理汇报。我决心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后人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了解旧社会对青年的毒害、腐蚀以及统治者的反动、腐朽，从而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的伟大，激发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现在我因年迈多病，无力胜任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只好把事情讲出来，由我女儿整理成书，暂定名为《魔窟生涯》，用它来作为我对往事的忏悔，作为后人的反面教材。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一点好的作用，那也算是没辜负周总理对

我的教导和期望。

由于有些事隔了多年，解放前我全部日记又在云南和平解放时全部搜去，迄今还没能领回，许多事可能有出入，尚请知道当时情况的读者，随时给予纠正、补充。因为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回忆录，应力求真实。这是我向读者最诚恳的请求。

还有，在此书出版前夕，有几位我一向最尊敬的前辈和社会知名人士，曾表示愿为此书题写书名或序言，我不敢玷污他们的笔墨，更怕有损他们的威望，但这种深情厚谊和对我的鞭策、鼓励，我将刻骨铭心永远感激，特在此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湘水宽阔浩荡，碧波滚滚；浏阳河迂回曲折，清波粼粼。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呵，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然而，她也养大了一些象我这样的不肖子孙。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她是圣洁的、慈祥的，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喂养着自己每一个儿女。

说来，读者也许不相信：少年时代的我，也曾象故乡水一样纯朴。

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岳州等地，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城内城外，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举城民众夹道欢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在剪着短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自己的姐姐。他知道姐姐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又参加了武汉军分校，此时正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医生。

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多么希望能象姐姐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呵！可惜他岁数太小，只会举着小旗跟着大人呼口号，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冲着自己的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

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而羞耻。

“马日事变”前夕，他亲眼看见何键、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备司令危宿钟从乡下窜回城来，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哼，老子又回来了！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看见不久之后，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部、革命党人经过他的家门口，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死。他偷偷地为他们哭泣，为他们不平。

一九三二年初，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的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象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象他们一样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单纯呵，慈母的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我买了张统舱船票，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离开了家门，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

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乱。母亲的慈颜，父亲的威容都将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去。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踏上了人生的征途。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姐夫，一想到有他在上海，我的心情就舒畅多了。

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团教导员……，仅凭他的经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姐姐曾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我难道还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岸边山上的红叶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山水之间，忘却了离愁，忘却了后忧。

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江面渐渐开阔，波涛汹涌，浪花拍打着船舷。景色更加壮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从甲板登上顶舱，尽情地观赏浩瀚的长江，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

“滚下去！ country man！（乡巴佬）”一个声音喝道。

转身一看。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我身后，仿佛我偷了他的什么东西似的。我知道这头等舱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真想争辩两句。转念一想，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坐的是外国人的船呵，初出门何必惹是生非？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

“咣啷！”没走几步，一个东西从上飞落到甲板上，我本能地吓得往后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头盒。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在上面得意地哈哈大

笑，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正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见此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搥了我一个耳光似的，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长江。说心里话，我真想连她们一起踢进江里。但理智告诉我，外国人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临走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说：“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好自为之。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我想，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否则，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呵！

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实混的不错，漂亮的洋房，华丽的摆设，可比父亲的“沈家大屋”阔气多了。当时，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我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象父亲那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其实，我哪里知道，这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四·一二”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革命队伍里一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幕前，一个在幕后；一个赤裸裸，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这时的姐夫已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初到上海，姐姐、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给我找工作。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处闲逛。上海可真大，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心想，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

上海租界林立，如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外国人在这里同样的趾高气扬。更令人气愤的是，听说不久前外滩公园门口还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让人越想越生气。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侮辱我们呢？当时，我可真不明白。现在我才懂得，这种反常的现象都是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呵！

半月后，我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吗？”我没想到姐夫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搔着后脑勺，憨笑地盯着姐夫说：“革命？！革命不就是象你们北伐时那样吗？”

“对！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任务。现在旧军阀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上秩序很乱，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面。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竟这么痛快答应留下我。我高兴地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的手喊道：“姐夫你真好！一言为定，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他轻轻地把我接回沙发上，郑重其事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好友都不能泄露，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另外，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这个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再找我，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我这个作姐夫的没交待清楚。”

说实在的，当时我刚刚十八岁，正是乐于冒险的年岁，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我当时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这个被人们称为“魔窟”的团体，开始了我的特务生涯。

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呵！

当上联络员后，我化名叫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四个情报组及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天，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我知道，“戴老板”就是特务处长戴笠。在当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经常听人说到他，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我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他经常去那里办公。到了警官学校，我交出姐夫给我的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里

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戴老板。我借着 he 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他。他中等身材，长方形的脸显得有些过长，嘴巴又宽又大，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眼睛让人望而生畏之外，其他都很平常，不象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打完电话，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并连忙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他微笑着打量着我，边拆信边问：“你是新来的吧？”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我旁边，和蔼地询问我个人和家庭情况。

看到 he 对待我那么和气，亲热，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他。他边听边点头，鼓励我往下说。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他越说越上劲，索性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

他足足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一百元钱，让我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待我的态度，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回到上海，我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也很奇怪，他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呵！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亲信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

事实果然如姐夫预料的那样，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五月，戴笠就提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情况是这样的。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因常常情报不实，戴笠怀疑这个脱党分子又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命令姐夫派人把徐昭俊押送南京。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学生，懂军事，会打枪，而我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连枪也没摸过，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姐夫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说是我犯了“团体”纪律，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当时他很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我，深怕我跑了。实际上，我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徐昭俊的信，也在暗中盯着他，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南京方面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等候。

下车后，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却没人理他，只是示意他上车，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我心里觉得好笑，因为当时他没上车，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所以我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当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车停了下来，来人从我手里接过信，就让我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走近监狱的。

徐昭俊见我一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他是犯人，他是犯人，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没错，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伸出来笑着对我说：“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 53 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室去看他，希望得到戴笠的夸奖和赏识。我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向他作了汇报。他高兴地夸我能干，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我着实吓了一跳。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的，组里组员成份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我大，而且阅历都比我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

我连忙摆手，摇头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

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

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承担了下来。内心深处虽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任务，不免又有些苦恼，恐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戴笠的栽培。

情报组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除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还要收集其他反蒋势力的情报和了解地方军阀往上海所派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方面的情报。当时我错误地理解为，共产党和新、旧军阀都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现在居然在江西、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这真是大逆不道。我竟把“马日事变”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负戴笠的栽培，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我一方面向组里的组员请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找刺探情报的门路。不久，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救火员可以爬房顶，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里，而且上海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自愿

报名参加了“业余消防队”。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不是为了去救火，而是“趁火打劫”，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有用的情报。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

一天，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被派到上海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工作。我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酬，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材料一定发给湖南湘光通讯社。”对方听我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从此，我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名陈仓。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像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

渐渐地，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我除自由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我如此能钻营，对我的工作很赏识。我自己也为自己的“才干”而自豪，却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使我在罪恶的泥塘里越陷越深。